

DOI:10.19702/j.cnki.jsemc.2019.03.007

中图分类号: B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88(2019)03-0049-10

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影响机制： 社会资本与自尊的作用

李艳茜¹ 赵佳佳² 李成彦³

(1.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2.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浙江 杭州 310000;
3.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大学生就业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而职业价值观对就业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职业价值观不仅对个人理想实现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文章以上海六所高校的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探究了职业价值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与学校社会资本对女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有显著预测作用,而自尊在社会资本与职业价值观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职业价值观 社会资本 自尊 女大学生 上海高校

一、引言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7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6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91.6%)基本与 2015 届(91.7%)数据持平,但与 2014 届(92.1%)相比有所下降。2017 年大学毕业生有 749 万人,2018 年大学毕业生数量有所增长。从庞大的人口基数可以看出,每年还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遇到一毕业就失业的难题。但是,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比例的 5.79%,再加上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就业的供求关系应该是平衡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大学毕业生会遇到一毕业就失业的难题呢?有研究指出,职业选择是个体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所作出的选择,除了客观因素外,主观方面也会对职业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滕远杰,2013),职业价值观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众多大学生更倾向于寻找符合自身发展的工作,找不到也不会“将就”,因此待业在家的青年越来越多(张宏,陈伟,2011)。而对大学生来说,大学期间是大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关键时期,职业价值观也处在萌芽期。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意识,帮助其掌握正确的就业方向,从而增加就业。由此可见,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研究十分必要。

20 世纪中叶,国外学者就对职业价值观展开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其研究起步较晚,直到 1980 年之后才相继开展研究。研究者们对不同群体职业价值观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进行了研究,亦不乏实证研究。然

收稿日期:2019-0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经济新常态下东部地区创业团队的社会资本与新创企业行为研究”(编号:17BGL097);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家族企业女性接班人的社会资本特征及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研究”(编号:14YJA630020);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女性创业者的社会资本特征及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编号:2014BGL014)。

作者简介:李艳茜(1993—),女,江苏省徐州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管理心理;赵佳佳(1993—),女,河南省濮阳人,硕士,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教师,研究方向:组织行为与人员测评;李成彦(1969—),女,辽宁省辽阳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组织行为。

而众多研究只是对职业价值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索,针对某一个因素对职业价值观的具体影响机制研究较少,这使得高校在培养和引导大学生形成和发展职业价值观时缺乏准确的依据。

在关系本位的中国社会,社会资本与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职业生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社会资本和职业价值观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明确,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资本和职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Holland(1959)的职业选择理论认为个体的职业选择受到个体性格方面的影响。我国学者也研究了人格特质等心理因素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自尊作为人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的认知和行为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社会资本、自尊与职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男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比女大学生要高出10个百分点,且女性的劳动报酬仍低于男性。女性群体的生活状况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问题,女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不但关系到女性自身发展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张旸,2015)。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选择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上海地区六所高校的女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了自尊、社会资本、职业价值观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与假设

(一)职业价值观

最早对职业价值观进行界定的是 Super(1950),他将职业价值观定义为:职业价值观是个人内在需求和追求目标在所从事的职业中的一种表达,是个人进行职业选择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后,有研究相继提出不同的职业价值观定义,如 Elizur(1984)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工作结果重要性的一种评价,可以划分成物质奖励、人际关系、社会声望、自我发展四个维度。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对职业价值观的研究渐渐丰富起来。楼静波(1990)认为职业价值观对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主要包含职业价值的原则、职业价值的取向和职业活动的薪酬期望三个方面。何华敏(1998)第一个从心理学角度对职业价值观进行定义,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一个评价工具,是人们用来测量社会上各种职业的优势、从事职业的意义以及对职业重要性衡量的标尺,其中职业需要是职业价值观的核心。

1999年,凌文铨发表《我国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研究》一文,该文以价值目标为新的切入点,对职业价值观进行新的界定,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职业的看法及态度,又或者是一种价值方面的取向,并将其划分为三个因素,即发展因素、声望地位和保健因素。

(二)社会资本与职业价值观

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并有利于该结构内个体某些行动的资源(Coleman,1988)。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Lin,2001)。邹宇春和周晓春(2016)从场域、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理论出发,论证了大学生社会资本应包含家庭社会资本和学校社会资本两大类。赵雪斐(2015)探讨了社会资本中家庭社会资本的结构问题,将其分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两个维度。本文将邹宇春与赵雪斐的观点进行了整合,将女大学生社会资本划分为家庭社会资本与学校社会资本。Super(1996)指出父母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社交方式等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Hill等人(2004)认为,父母受教育水平反映了父母的能力和技能,还会通过信念、价值观等来影响父母的教育教养行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子女的职业价值观产生影响。Duffy等人(2007)提出,父母的收入与子女的职业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Keller等人(2008)指出父母的工作模式对子女成年后的职业目标和职业理想产生显著影响,父母的工作观念间接影响子女成年后的职

业活动。Lee 等人(2016)指出,具有较高的工作地位、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父母在价值观上的表现更倾向于价值自主权,因此,这种价值观很可能通过亲密互动传递给孩子。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证实家庭社会资本对就业选择存在影响。赵雪斐(2015)认为大学生拥有的家庭社会资本对就业认知有积极影响,即家庭经济基础越好,家庭社会资本越丰富,学生的就业认知就越积极、乐观,也会在择业中更重视自身价值和是否符合自身兴趣。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家庭社会资本对职业价值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假设 1a:家庭社会地位对职业价值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假设 1b:家庭关系网络对职业价值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李艳(2015)指出,学校是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丰富个人思想、促进职业价值观正确形成的重要场所,大学时期是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探索形成和确定时期。聂佳曼(2013)指出,职业价值观与学校归属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张有为(2012)研究发现大学生中人力资本(英语过六级、有社会实践经验等)、社会资本(父母职业所在社会阶层为高等阶层等)越丰富,在择业时会更倾向于去经济发达的地区就业,所期望的月薪水平也越高。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学校社会资本对职业价值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假设 2a:学校社会地位对职业价值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假设 2b:学校关系网络对职业价值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三)自尊的中介效应

自尊是一种对自我价值肯定或否定的态度,由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两个维度构成(Coopersmith, 1967)。一方面,自尊作为人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受到后天环境、自身能力的影响(Holland, 1959)。家庭和学校是大学生主要的成长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自尊水平。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家庭经济地位(SES)与自尊显著正相关,个体在社会经济地位、财富等方面越丰富,自尊水平越高(Twenge, 2002)。相反,贫困大学生的自我认识 and 自我评价更消极,自尊水平显著低于非贫困生(张文新和林崇德, 1998;康育文和陈青萍, 2006)。同时,家庭投资理论认为,低 SES 家庭投资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比较缺乏,相应对子女的教育发展支持较少,而高 SES 家庭拥有更多的资本用于子女教育发展的投资,这对个体成长、自我概念形成、求学历程等均有重大影响(Matthews & Gallo, 2011)。另外,魏运华(1998)研究发现,学业成绩对少年儿童自尊有显著影响;满意的师生关系、教师对学生的支持关心等正向情绪有助于其自尊的发展;少年儿童同伴关系满意度、在同伴中的社会一领导性、敏感一独立性有益于提升其自尊水平;他们对同伴的攻击一破坏性会影响其自尊水平的发展。同时,张丽华等人(2009)研究发现,同伴关系满意度越高、师生关系满意度越高,他们的自尊总分就越高,这表明良好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自尊水平。另一方面,自尊作为人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的认知和行为具有重大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护士的自尊与职业价值观显著相关(Iacobucci, 2012),自尊能预测职业价值观,可根据影响护士自尊进行合理干预,以提高护士自尊及对职业价值观的认同(郑翠红, 2009)。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自尊在社会资本与职业价值观之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的假设模型如右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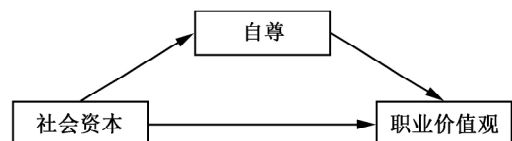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的假设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信息

本研究以上海高校的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

抽样的方式,从不同的 985 高校、211 高校、普通高校选取被试对象,让被试对象在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专业(文科/理科/工科)、独生子女(是/否)上平均分布。问卷统一发放、现场施测、现场回收。本研究问卷在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政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六所高校的在校本科生中发放。研究者在以上六所高校的自习室和图书馆发放问卷,每位被试对象在答完问卷后都会获得一份小礼品,共发放问卷 880 份,最终回收问卷 8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503 份,有效率为 62.88%。其中,上海师范大学与上海政法学院共 208 份,占 41.4%,华东师范大学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共 158 份,占 31.4%,上海大学 137 份,占 27.2%。大一学生 73 名,占 14.5%;大二学生 175 名,占 34.8%;大三学生 175 名,占 34.8%;大四学生 80 名,占 15.9%。文科生 266 名,占 52.9%;理科生 171 名,占 34%;工科生 66 名,占 13.1%;独生子女 330 名,占 65.6%,非独生子女 173 名,占 34.4%。

(二)研究工具

家庭社会资本问卷采用的是赵雪斐(2015)开发的问卷。该问卷共 15 道题,分 2 个维度:家庭社会地位,家庭关系网络。家庭社会地位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父母的政治面貌等题目,家庭关系网络包括与父母联系密切的人数、社会联系等题目。

学校社会资本问卷采用邹宇春和周晓春(2016)编制的大学生社会资本问卷中的学校资本部分。该问卷共 15 题,分为 2 个维度:学校社会地位、学校关系网络。学校社会地位包括学生在校期间获得的奖学金、职业资格证书等,学校关系网络包括与同学、老师、舍友的关系等。

自尊采用的是杨烨和王登峰(2007)修订的原 Rosenberg 自尊量表,该量表通过实验研究编制,并通过相关信效度检验,最终提取两个因子:自我否定、自我肯定。该量表的信效度较高,并且语句清晰简单,易于施测和评分。共 10 道题,信度为 0.84。

职业价值观量表采用的是凌文铨(1999)的职业价值观量表,该量表是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开发的,拥有较好的信效度。该量表有 23 道题目,三个维度:声望地位、发展因素和保健因素。声望地位包括单位知名度高、易成名成家等;发展因素包括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公平竞争、学以致用等;保健因素包括收入高、福利好、有可靠的劳保、医疗、退休金等。该量表的信度为 0.84。

同时,本研究参照以往职业价值观研究的做法,选取年级、专业类型,学校类型和是否为独生子女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采用 SPSS 19.0 软件、AMOS 24.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21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0.07%,远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职业价值观与自尊的整体表现

如表 1 所示,大学生在职业价值观 3 个维度上,得分最高的是保健因素,得分最低的是声望地位;在自尊 2 个维度上,自我肯定的分数比自我否定更高。

(三)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差异

本研究共选取四个人口学变量,包括年级、学科类型、学校类型以及是否为独生子女。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年级在发展因素($F=7.89^{***}$, $p<0.001$)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学科类型在声望地位和发展因素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保健因素($F=3.33^*$, $p<0.05$)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学校类型在职业价值观上

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女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选择与学校类型无关。

表1 职业价值观与自尊各维度均分的描述统计(N=503)

		M	SD
职业价值观	声望地位	3.26	0.72
	发展因素	4.06	0.58
	保健因素	4.16	0.61
自尊	自我肯定	3.19	0.41
	自我否定	3.00	0.60

因为是否为独生子女只分为两类,所以对所得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声望地位、发展因素、保健因素上均无显著性差异,说明是否为独生子女与择业的价值取向无关。

(四)家庭社会资本对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家庭社会资本量表的各个题项均是分类变量,因此用家庭社会资本的各题项与职业价值观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因题项较多,在此只报告有显著关系的题项)。

表2 家庭社会地位对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题目	因变量	F	η^2	多重比较
家庭社会地位	母亲的政治面貌	保健因素	4.98**	0.02	民主党派>中共党员
	父亲的职位行政级别	保健因素	4.58**	0.04	无级别、科级、处级>厅级
	母亲的职位行政级别	发展因素	2.7*	0.02	
		保健因素	4.2*	0.03	

注:* p<0.05;** p<0.01。

由表2可以看出,家庭社会资本中的家庭社会地位维度对职业价值观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母亲的政治面貌、父亲的职位行政级别都使女大学生在找工作时更看重保健因素,而母亲的职位行政级别则使女大学生在找工作时同时看中保健及发展因素,由此假设1a成立。而家庭关系网络的各个题目在声望地位、发展因素、保健因素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女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选择与家庭关系网络无关,由此,假设1b不成立。

(五)学校社会资本对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在学校社会资本中,学校社会地位的题项主要为分类变量,因此用方差分析的方式来原因其与职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而学校关系网络的题项为连续变量,因而用回归分析来说明其与职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表3 学校社会地位对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题目	因变量	F	η^2	多重比较
学校社会地位	社团职务 ^a	发展因素	4.07**	0.02	1>4,2>4,3>4
		保健因素	2.71*	0.02	1>2,1>4
	职业资格证书 ^b	发展因素	14.15**	0.08	
		保健因素	3.78*	0.02	
	考试等级证书 ^c	声望地位	3.08*	0.02	1>4,2>4,3>4
		发展因素	4.54**	0.03	1>3,1>4,2>3
	不及格或重修科目 ^d	保健因素	3.25*	0.02	2>3
		发展因素	3.97*	0.02	3>1,4>1

注:* p<0.05;** p<0.01。社团职务 a,1=没有,2=一般成员,3=社团副职,4=社团主席;职业资格证书 b,1=没有,2=1-2个,3=3-4个,4=5个及以上;考试等级证书 c,1=没有,2=1-2个,3=3-4个,4=5个及以上;不及格或重修科目 d,1=5门及以上,2=3-4门,3=1-2门,4=没有。

由表3可以看出,女大学生在学校的社会地位,如社团职务、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等级证书以及不及格或重修的科目等因素使女大学生择业时考虑发展因素、保健因素,因此假设2a成立。

将学校关系网络与自尊、职业价值观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学校关系网络与自尊、职业价值观的相关分析

	声望地位	发展因素	保健因素	自我肯定	自我否定	学校关系网络
声望地位	1					
发展因素	0.29**	1				
保健因素	0.32**	0.22**	1			
自我肯定	0.10*	0.20*	0.12**	1		
自我否定	0.00	0.10*	-0.05	0.43**	1	
学校关系网络	-0.02	0.17**	0.01	0.27**	0.30**	1

注:* p<0.05;** p<0.01

由表4可知学校关系网络与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发展因素均存在显著性正相关;自我肯定与声望地位、发展因素、保健因素、学校关系网络存在正相关,自我与发展因素呈正相关。将学校关系网络与职业价值观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学校关系网络对发展因素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Adjusted R ²	F	β	SE
发展因素	学校关系网络	0.03	14.82***	0.17	0.05

注:*** p<0.001。

(六)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检验了自尊在社会资本和职业价值观之间的中介作用(家庭社会地位、家庭社会网络与学校社会地位的题项多为类别变量,因此将类别变量转化成虚拟变量)。

由表6可以看出,父亲职位行政级别对发展因素的总效应不显著,但父亲职位行政级别对自我肯定的影响显著,自我肯定对发展因素的影响显著,即间接效应显著,因此自尊在父亲职位行政级别和发展因素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同样,自尊在家庭社会地位中的父亲职位行政级别、母亲工作单位性质、学费负担情况和在家庭社会地位中的获得奖学金、担任学生(团)干部和发展因素中均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在学校社会地位中的获得奖学金、担任学生(团)干部和发展因素中均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在家庭关系网络和发展因素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同时将学校关系网络作为预测变量,发展因素作结果变量,自尊作中介变量,考察学校关系网络对发展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如图2、图3所示,自我肯定在学校关系网络与发展因素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²/df=1.72,SRMR=.03,CFI=.96,TLI=.96,RMSEA=.04;而自我否定在学校关系网络和发展因素之间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表6 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ΔR^2	F	β	SE	t
家庭社会地位	自我肯定	父亲职位行政级别(处级 & 科级)	0.01	5.18*	0.10	0.04	2.28*
	发展因素	自我肯定	0.04	19.72***	0.20	0.04	4.44***
	自我肯定	母亲工作单位性质(个体经营 & 国有企业)	0.01	8.33**	0.13	0.04	2.89**
	发展因素	自我肯定	0.04	19.72***	0.20	0.04	4.44***
学校社会地位	自我肯定	学费负担情况(勉强承担 & 完全可以承担)	0.01	4.92*	0.10	0.04	2.22*
	自我否定		0.05	26.29***	0.22	0.04	5.13***
	发展因素	自我肯定	0.04	19.72***	0.20	0.04	4.44***
	发展因素	自我否定	0.01	5.45*	0.10	0.04	2.34*
	自我肯定	获得奖学金(校级 & 系(院)级)	0.01	4.26*	0.09	0.04	2.06*
	自我否定		0.01	4.22*	0.09	0.04	2.05*
	发展因素	自我肯定	0.04	19.72***	0.20	0.04	4.44***
	发展因素	自我否定	0.01	5.45*	0.10	0.04	2.34*
	自我肯定	担任学生(团)干部(系(院)级 & 班级)	0.02	9.67**	0.14	0.04	3.11**
	发展因素	自我肯定	0.04	19.72***	0.20	0.04	4.44***
家庭关系网络	自我肯定	联系密切的人中行政级别最高是(处级 & 科级)	0.01	6.23*	0.11	0.04	2.50*
	发展因素	自我肯定	0.04	19.72***	0.20	0.04	4.44***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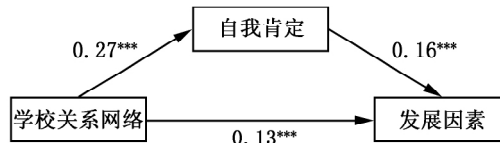


图2 自我肯定中介效应路径分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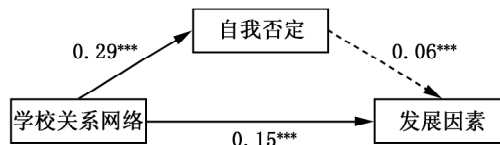


图3 自我否定中介效应路径分析图

由图2、图3可知,自尊在学校关系网络与职业价值观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家庭社会地位、学校社会地位与职业价值观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地位、学校社会地位完全通过自尊影响职业价值观,由此假设3成立。

五、研究发现与研究启示

本研究以上海六所高校的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女大学生的社会资本、自尊对职业价值观的影

响,研究假设基本上得到验证。

(一)家庭社会资本对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研究发现,家庭社会地位对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影响显著,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已有研究认为,父母的社会地位与收入等对大学生单位选择、毕业去向等有着显著影响(文东茅,2005;郑洁,2004;李黎明等,2008)。同时,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地位低的女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更注重福利待遇等保健因素。Lee等人(2016)研究发现,成人具有较高的工作地位倾向于价值自主权,这种价值观很可能通过亲密互动传递给孩子,这也使家庭经济地位高的女大学生在择业时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在选择时可能会忽略保健因素,而更加注重是否符合自身兴趣等发展因素。本研究亦得出了与已有研究不一致的结论,即家庭关系网络并未对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三:第一,女大学生在考虑就业时,更多考虑自身情况,关注点多为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自己能做什么;第二,家庭社会联系广泛的学生在择业时获得就业信息更多,但在职业价值观的选择上,并不会对学生的选择起引导作用;第三,“关系”是不稳定的,特别是父母的社会关系易受多种因素影响,使女大学生产生“求人不如求己”的想法。

(二)学校社会资本对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学校社会地位对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产生显著影响,这印证了张有为(2012)、李艳(2015)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能力等在职业价值观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成绩不好、能力弱的女大学生学校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与学校社会地位高的女大学生相比,她们在择业时更加注重待遇、福利等保健因素。同时,本研究发现,女大学生的学校关系网络对其职业价值观的发展因素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对声望地位及保健因素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调查的大学生都希望在大城市就业,不愿意回乡,认为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发展机会也多,所以无论学校关系网络强弱,都倾向于留在大城市工作。保健因素的重要方面是福利好,从目前看,女大学生都希望找一个福利好的单位,与其学校关系网络强不强没有太大的关系。

(三)自尊的中介作用

自尊在社会资本和职业价值观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首先,自尊在家庭社会地位与发展因素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其次,自尊在女大学生家庭关系网络和发展因素之间也起完全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家庭关系网络对自尊没有显著影响,家长的交友范围、交友人数等属于父母的圈子,不一定会对孩子产生影响。生物生态学理论认为,父母的工作环境或社会关系网属于外在系统,不是个体直接参与的,这层系统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Papalia D. E.等,2007)。但家庭的关系网络间接反映了家长的气质类型和教养方式,这对孩子的个人心理特质有着极为紧密的影响,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对自尊有着强相关(Coopersmith,1975;张丽华,2006),所以,家庭关系网络可以通过自尊来影响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选择。再次,自尊在学校社会地位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效应。学生在学校中的奖学金水平、担任学生干部情况并不能直接影响职业价值观的选择,而是通过影响自尊水平的方式来影响发展因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并不会直接让学生做出职业上的判断,但这种经历会影响学生的自我认知,其自尊水平会有所提升,他们可能更关注未来的发展。最后,自尊是学校关系网络和发展因素的中介变量,女大学生自尊水平越高,越注重职业中的发展因素。自尊水平高的女大学生对自身要求比较高,对未来的期望也更高,她们希望自己能在工作岗位上发展自己的才能,有所建树。

(四)职业价值观的个体差异

本研究也检验了职业价值观及自尊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首先,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个体择业时价值取向不同,低年级的女大学生较高年级的女大学生更加注重个人兴趣等发展因素,而高年级的女大学生较低年级的女大学生更注重福利待遇等保健因素。刚上大学的大一女生大多怀揣梦想,期望日后在职业上能有所发展进步,找一份自己感兴趣并能得到发展的职业。而进入大三、大四以后,在面临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她们不得不先放弃自己的梦想,优先考虑生存需要,故而把保健因素放在第一位。其次,文科女大学生比理科、工科女大学生在保健因素上的得分更高,说明文科女大学生比理科、工科女大学生更注重保健因素,这与李明和喻茜(2017)的研究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地区差异。在上海地区,对技术性岗位需求量较高,理科、工科的学生更好就业。另外,理科、工科的女生较少,常常供不应求,因此理科、工科的女大学生就业压力相对较小。而文科类女大学生对应的岗位多为职能类岗位,职位少、要求高、流动性大,这使得文科类女大学生就业压力更大,因此她们更注重职业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 [1]滕远杰.基于企业需求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策略分析[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5):110—111.
- [2]张宏,陈伟.大学生人力资本失灵现象探析——基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1,(1):63—66.
- [3]张旻.基于社会资本的湖南省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2015.
- [4]Elizur D. Facets of work values: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work outcom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4, 69(3):379—389.
- [5]楼静波.当代青年的职业价值观[J].青年研究,1990(Z1):22—28.
- [6]何华敏.我国内地四类企业职工职业价值观比较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1):105—110.
- [7]凌文铨,方俐洛,白利刚.我国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研究[J].心理学报,1999,(03):342—348.
- [8]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Volume 94Number):95—120.
- [9]Lin 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P).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0]邹宇春,周晓春.大学生社会资本:内涵,测量及其对就业的差异化影响[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0(06):94—103.
- [11]赵雪斐.家庭社会资本对高校学生就业意向影响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5.
- [12]Parent academic involvement as related to school behavior, achievement, and aspirations: Demographic variations across adolescence[J]. *Child Development*, 2004, 75(5):1491—1509.
- [13]Duffy R D, Sedlacek W E. The work values of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Exploring group differences[J].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11, 55(4):359—364.
- [14]Keller B K, Whiston S C. The role of parental influences on young adolescents career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008, 16(2):198—217.
- [15]Lee B, Landberg M, Lee K H. The change of work value endorsement among Korean adolescent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ocioeconomic statu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Guidance*, 2016, 16(1):45—68.
- [16]李艳.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影响因素分析[D].大连海事大学,2015.
- [17]聂佳曼.医学生学业压力、职业价值观和学校归属感的相关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4.
- [18]张有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择业取向影响实证研究[D].扬州大学,2012.

- [19]Rosenberg M.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J]. *Princeton*, 1965, 3(2):1780—1790.
- [20]Twenge J M, Campbell W K. Self-esteem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 meta-analytic review[J].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2, 6(1):59—71.
- [21]张文新,林崇德.青少年的自尊与父母教育方式的关系——不同群体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J]. *心理科学*, 1998(06): 489—493+574.
- [22]康育文,陈青萍.贫困大学生身心健康与自尊、人际关系、成就动机的相关[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5):510—512+509.
- [23]Matthews K A, Gallo L C.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athways linking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hysical health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0, 62(1):501.
- [24]魏运华.学校因素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影响的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8(2):12—16.
- [25]张丽华,张索玲,宁微.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影响青少年自尊的路径分析[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11):1378—1381.
- [26]Iacobucci T A, Daly B J, Lindell D, et al. Professional values, self-esteem, and ethical confidence of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J]. *Nursing Ethics*, 2013, 20(4):479—490.
- [27]郑翠红,黄湘晖,杨美丽,等.护士自尊、个人发展性竞争水平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 2009, 44(6):485—487.
- [28]杨烨,王登峰.Rosenberg 自尊量表因素结构的再验证[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9):603—605+609.
- [29]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731—745.
- [30]李明,喻茜.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现状研究[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2(2):119—124.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Occupational Values: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and Self-esteem

LI Yanqian¹ ZHAO Jiajia² LI Chengyan³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2. Shanghai World Foreign Language Academy, Zhejiang Hangzhou, 310000

3.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Law,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of social concern, and professional valu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employment. Professional values not on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 ideals, but also rela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Taki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six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rofessional value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school social capital have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s o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occupational values, and self-esteem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occupational values.

Keywords: Professional values Social capital Self-esteem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Shanghai University

(责任编辑 张桂芳)